

冷战视角下 1959 年西藏反动上层发动的全面武装叛乱

——美、印、苏三国的角色与行动比较

杨亚波

(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 西藏 拉萨 850000)

[关键词] 西藏; 全面武装叛乱; 遏制政策; 政治遗产; 中间地带

[摘要] 二战后, 随着“杜鲁门主义”的提出, 国际关系进入冷战阶段。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采取“一边倒”外交方针, 美国为了对付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围绕 1959 年西藏反动上层发动的全面武装叛乱采取了一系列行动, 构成了对中国的遏制政策的一部分。与此同时, 获得民族独立不久的印度, 全盘继承英帝国主义的殖民遗产, 在加紧侵占中国领土的同时, 也在十四世达赖集团武装叛乱失败后逃亡印度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中苏关系经过一段“蜜月期”后, 随着 1956 年苏共二十大的召开, 友好关系逐渐破裂。苏联在西藏反动上层发动的全面武装叛乱及边境冲突上采取支持印度的立场, 成为中苏关系恶化的一个征兆。这一过程中, 也伴随着美国、苏联对作为“中间地带”国家代表印度的争夺。通过 1959 年西藏反动上层发动的全面武装叛乱和边境冲突可以看出, 两个阵营、两极理论并不能恰当地解释当时的国际关系, 毛泽东关于“中间地带”的划分更加符合当时的国际现实。

[中图分类号] K1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0003 (2022) 02 - 0116 - 09

一、引言

任何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 都是内外因共同因素的结果, 1959 年西藏反动上层发动的全面武装叛乱和边境冲突亦是如此。已有的相关研究对美国、印度、苏联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扮演的角色给予了关注, 但尚缺少一定的国际视野, 对其属于二战后美国

全球冷战战略的组成部分, 使印度分别与美国、苏联短暂结盟, 成为中苏关系不断恶化、苏联支持印度立场等方面体现出的国际关系的复杂性的认识有待进一步深化。基于此, 本文分析美、印、苏三国在 1959 年西藏反动上层发动的全面武装叛乱及边境冲突中采取的种种行动及背后的政治考量, 体现国际关系的复杂性。

[收稿日期] 2021 - 05 - 12

[基金项目] 本文系 2019 年度西藏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专项资金重大委托项目“西藏深度参与“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创新思路研究”(项目编号: 19ZGJ02) 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杨亚波 (1982—), 陕西凤翔人, 副研究员, 主要从事西藏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相关研究。

二、美国: 遏制政策在中国的表现

二战后,英国逐渐衰落,美国日益崛起,成为西方体系的主导者。为了应对苏联快速崛起的影响,美国国务院首席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受命构思美国应对苏联的全面措施。在1946年发自美国驻苏大使馆的一份详电中,凯南分析了苏联的世界事务观,勾勒出了应对之策,从而奠定了未来半个世纪美国对外政策的基础。针对苏联的斗争观,凯南提出“美国政策必须是一项‘长期的、耐心而又坚定、警惕的遏制政策’。”他将遏制视为对美国民主的一种考验,以践行一项明智的长期对外政策,同时又力促苏联的改变,并最终使其缓和革命目标^{[1]53}。凯南的遏制战略被美国政府普遍接受。此后,美国政府着手于复杂的任务,将战略概论转化为具体举措。这些举措包括兵役的新战略,更重视经济治国之术和对外援助,以及持续不断地将外国纳入双边和多边的联盟网络中^{[1]53}。1947年3月,随着“杜鲁门主义”的提出,美国正式推出了遏制政策。遏制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指向了“苏联和中国的亚洲周边地区”。特别是,随着1949年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所有这些进展最重要后果是:美国对外政策从有限的反苏转向了更广泛的反共运动。当时主要目标是防止中苏阵营中任何一国的领土扩张^{[1]58}。在中美关系上,美国采取“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政治上孤立”的对华敌对政策;中国为了争取生存空间,中苏双方1950年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国也“一边倒”向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

对中国西藏,当美国在1947年正式推出遏制战略后,1948年初,西藏噶厦孜本·夏格巴率“商务代表团”访问美国,意在寻求对所谓“西藏独立”的支持时,他们得到了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及远东司司长的接见。马歇尔不顾美国只能向主权国家出售黄金的规定,批准了此项交易。1950年当中央政府拟以

和平方式解放西藏时,美国将从幕后支持西藏分裂势力作为其实施遏制政策的重要组成,积极采取一系列行动。1950年3月,美国驻印度加尔各答领事馆与夏格巴密商,决定将武器储存在沿西藏边境的锡金、尼泊尔、不丹一侧,以便藏方使用;5月,美国与印度达成协议:美国将大批援藏步枪、机关枪、手榴弹及弹药等在印度加尔各答卸下,免受检查,由美士兵经大吉岭武装护送运往西藏。11月1日,国务卿艾奇逊谴责人民解放军“侵略”西藏的行动。半个月后,萨尔瓦多代表团团长赫克托·戴维·卡斯特罗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讨论中国“入侵西藏问题”,他的背后同样是美国。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签订后,美国不但怂恿达赖集团利用联合国提出“西藏问题”,鼓励达赖流亡不丹、锡金或尼泊尔,也承诺将接受达赖等一百人到美国避难。在此之后,围绕所谓“西藏独立”等问题,美国与噶厦之间进行了长期的策划。1955年春天,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噶伦堡城郊征募西藏士兵,并先后在台湾、冲绳群岛、塞班岛、关岛等地秘密进行训练,这是1959年前后策动和支持十四世达赖喇嘛武装反叛和出走的前奏。所谓“西藏问题”的“国际化”正是上述过程的产物^[2]。美国政府之所以要支持西藏内部分裂势力的独立活动,“主要是因为他们冷战遏制政策中的作用,这一点达赖喇嘛是说对了。……尽管其最主要的目标是竭其所能‘阻止中国共产党’,但华盛顿认为,如果达赖喇嘛逃出中共的控制,他就能以某种方式巧妙地宣布西藏独立,这也是千真万确的。”^[3]

20世纪50年代,美国针对所谓“西藏问题”采取的上述一系列行动并不是孤立的,与朝鲜战争、20世纪50年代两次台海危机一起,构成了美国对属于社会主义阵营中国的遏制政策一部分。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全面卷入西藏事务^{[4]597}。1954—1955年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美国政府奉行“大规模报复战略”,试图以核威慑来实现自己的政策目标。对

中国西藏,在 1956 年匈牙利事件发生的背景下,1956 年夏,美国作出了支持西藏抵抗运动的决定。1958 年第二次台海危机发生后,美国对于西藏分裂势力的支持进一步加大,1959 年 3 月西藏反动上层发动全面武装叛乱,十四世达赖叛逃印度。

在上述事件发生过程中,美国中央情报局作为遏制政策的具体执行部门,发挥了很大作用。“冷战伊始,杜鲁门得到国会的大力支持,重组美国军事架构以便有能力遏制共产主义。根据 1947 年的《国家安全法》,美国成立了中央情报局,这是战略情报局的产物。作为比战略情报局规模更大的情报组织,中央情报局尽管备受争议,但很快成为美国遏制计划的关键组成部分。中央情报局之所以‘关键’,是因为中央情报局收集与分析的信息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基础。中央情报局之所以‘备受争议’,是因为它传承了战略情报局的遗风,情报局人员往往在海外执行秘密任务,寻求颠覆那些被认为敌视美国的政府。”^{[1]66}艾森豪威尔时期,采取“新貌(New Look)”对外政策,核心理念“在于重新获得主动权,同时降低成本。”除了核武器是这一战略的一大成分之外,“同盟、隐蔽行动(心理战)和谈判之类其他因素也是如此。”^{[5]150}中央情报局作为隐蔽行动的实施部门,艾森豪威尔极大地扩展了这一部门的职责。中央情报局执行一系列“秘密”行动,以使均势向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倾斜,但又不必使用大规模(和公开的)军事力量^{[1]86}。艾森豪威尔政府期间隐蔽活动的全貌仍未公之于世。不过,关于涉及的活动种类仍有证据可用:国家安全委员会在 1954 年的一项指令中列举了下面这些“宣传、政治行动,经济战,脱逃、躲避和撤离措施,针对敌对国家或组织的颠覆(包括援助地下抵抗运动、游击战和难民解放团体),支持自由世界的受威胁国家里的当地反共势力,欺骗计划和欺骗行动,还有为完成上述任务必须的、与本指令相符的一切活动。”^{[5]160}在 1959 年前后支持西藏武装叛乱之前,中央情报局组织推翻了两个外国政府(1953 年在伊朗,1954 年在危地马拉),

试图推翻另外两个外国政府而未遂(1958 年在印度尼西亚,1960—1961 年在古巴),向东欧国家渗透难民以试图在那里激发混乱,从缅甸和老挝操纵针对中国和北越的游击战和准军事行动,组织在苏联和中国上空的空中侦察,并且至少考虑过刺杀若干外国领导人的阴谋(周恩来、帕特利斯·卢蒙巴、菲德尔·卡斯特罗和拉法埃尔·特鲁希略)^{[5]161}。除了上文谈到的 1955 年中央情报局实施的秘密行动之外,目前公布的一些档案资料表明,1959 年以十四世达赖为代表的西藏上层反动统治集团发动的武装叛乱得到了美国的幕后支持。叛乱发生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西藏开展了秘密援助“藏独”的地下运动;叛乱发生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先后举行 6 次会议,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听取中情局局长杜勒斯关于西藏局势最新进展及相应评估的汇报,旨在为美国决策层提供信息支持^[6]。其中一份报告载道“西藏叛乱对美国说是一件好事,特别是他有利于加强亚洲中立主义者反对中共的情绪……尽可能地延长叛乱时间,并在所有公开的信息媒体上对此做最大限度的宣传,这些符合美国利益……具体行动是尽我们一切所能帮助达赖喇嘛流亡。”^[7]以此为指导,西藏反动上层发动全面武装叛乱后,中央情报局在西藏开展了一系列准军事行动,如在西藏的公路袭扰战、对尼泊尔北部地区木斯塘西藏分裂势力的支持、为“藏独”势力提供行政培训^[8]等。本质上,美国通过中央情报局对十四世达赖集团分裂活动进行幕后支持,是其在冷战背景下采取遏制政策反共产主义、反社会主义、反中国的一种具体体现。

三、印度:继承英国在中国西藏 殖民遗产的体现

二战后,随着冷战的到来,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两大阵营,昔日的大英帝国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开始放弃曾经的殖民资产。对中国西藏,英国将殖民资产让

渡给了自己曾经的殖民地——刚刚获得民族独立的印度,而印度也欣然接受了英国的侵略遗产。1947年7月26日,英国正式致函西藏(地方)政府,声明:西藏和大不列颠业已存在的友好关系将由印度政府予以承袭,这些权利和义务的移交以现存条约的有关条款为依据。同一天,即将独立的印度政府也给西藏(地方)政府发出了一封信函,内容与英国的信函非常相似,大意是:印度政府依据现在的条约将承继英国在西藏的一切权利和义务,直到双方当中的任何一方希望签订新的条约时为止;并保证将继续发展彼此间的友好关系并对维护西藏自治给予关心。正当西藏(地方)政府就如何回复印度公函展开大辩论的时候,8月15日,英国政府正式将印度政权移交给由国大党组建的印度民族政府。同时,也将由英国殖民占领军非法侵占的中国领土一并移交给印度国大党政府。印度对此一概“照单全收”,不仅接管了英国在拉萨的使团和在其他居民中心的商务代办处,也接管了英国殖民者非法侵占的卫藏等区^{[4]10-11}。1950年当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和平解放西藏时,同年8月至11月,印度政府先后五次向中国政府递交备忘录和照会,称印度政府对中军进入西藏深感遗憾^[9],其中最后一个照会中明确指出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是所谓的“宗主权”,这充分表明印度坚持了英印时期对西藏的外交政策。在具体行动方面,“我们知道,早在1950年,在印度官员当中就有很多人开始支持对西藏采取军事行动。持这种支持态度的人是以知名人士如副总理沙德尔·帕特尔和外交部的高级官员为首的。而尼赫鲁和印度驻华大使K·M·潘尼迦则主张印度保持中立,他们的意见取得了胜利。可是,尼赫鲁至少也在一定限度内同意了指责他的人的看法。印度情报局局长M·N·穆立克透露,尼赫鲁在1952年曾指示他‘与达赖喇嘛的兄弟顿珠以及所有其他逃亡者保持联系,并用一切可能的办法帮助他们’。”^{[10]238}西藏和平解放后,尼赫鲁总理显得十分无奈和惋惜。他1954年5月在印度国会人民院

说:就西藏而言,协定(“十七条协议”)是对那里现存(西藏和平解放后)情况的承认。印度接受这一协定就放弃了英国在西藏的帝国主义遗产^{[11]109}。这也表明印度对放弃英国留给他的殖民遗产的不甘,将对“十七条协议”的执行进行干扰破坏。

幕后支持十四世达赖分裂集团的“西藏独立”运动是印度采取的具体行动,1956年十四世达赖去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大会期间,夏格巴^①、嘉乐顿珠、当才活佛^②、索康等众多西藏反动上层分裂分子鼓动达赖开展“西藏独立”运动。关于逃亡印度噶伦堡的藏族人对中国进行颠覆和破坏活动问题,中方一再提请印方注意,并向印方提供有关情况,要求印方予以取缔。但印方以中方提供的情况不实为借口,对这些活动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成为两国关系中的消极因素^{[11]110}。这表明,印度对十四世达赖集团从事的分裂破坏活动采取了放任自流乃至暗中支持的态度。

1959年3月,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西藏反动上层发动了旨在分裂国家的全面武装叛乱。从外部因素来看,印度在十四世达赖发动武装叛乱、叛逃印度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1959年3月31日,十四世达赖抵达印度境内,受到印度的热烈款待,印度外交部派遣曾在拉萨担任过总领事的司长梅农前往边境迎接,并一直陪伴到新德里。4月18日十四世达赖等一行到达提斯浦尔,由印度外交部的官员散发了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声称“宗主权是汉人强加在西藏人身上的。”在中国政府指出该声明是伪造的,不是达赖本人而是别人强加于他的一个谎话连篇、漏洞百出的拙劣文件后,4月22

① 在英国留过学的原西藏地方政府孜本,于1948年曾作为“西藏商务使团”团长去美、英活动,要求援助西藏独立。1950年,他又被任命为“西藏亲善使团”团长再次去英、美活动。西藏和平解放后,夏格巴一直居留噶伦堡,与阿乐群则等人一起进行叛国活动。

② 嘉乐顿珠和当才活佛是十四世达赖的两位兄长,嘉乐顿珠于1956年11月23日,在达赖过境去印前一日,赶到春丕谷会见达赖,准备在达赖过境后先在岗拖进行“西藏独立”的活动,策划由达赖在纪念会的佛教讨论会上,正式提出“西藏独立”问题。

日十四世达赖达到印度为他安排的住地穆索里,又发表了一个简短声明,否认提斯浦尔的声明是别人强加于他的,这就欲盖弥彰得更加暴露了印度某些人的拙劣伎俩^{[12]79-80}。1959年4月17日,孟买自由通讯社曾引用伦敦《每日电讯》驻印度记者的话说,据向他提供西藏消息的人透露,实际上十四世达赖逃跑时确实得到了印度的协助^{[10]239}。在初抵印度的一段时间里,叛乱集团聚集在穆索里。4月24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在此会见了十四世达赖。事实上,1959年3—4月,尼赫鲁总理在印度人民院和联邦院讨论西藏局势时多次发表讲话和声明。称西藏“暴乱”的基础“是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北京没有遵守关于西藏自治区的协议和对印度提出的保证。”那里发生了“武装干涉”,他“非常同情西藏人民”,“衷心希望西藏人民能维持并且享受他们的自治,而不要受其他人的压迫和镇压。”^{[9]247}印度执政党国大党主席和总书记则更为露骨地宣称,西藏是一个“国家”,或者是“自治国家”,他们联合一些政党组织什么“支援西藏人民委员会”,公然要求把西藏问题提交联合国,并且要求召开由印度、西藏和中国三方面参加的另一“西姆拉会议”式的会议,要解决这个纯属中国内政的问题。印度政府同时利用西藏反动上层发动的全面武装叛乱事件通过各种方式煽动反华反共高潮,自2月底到4月初的一个多月内,印度36家报纸就发表了三百多篇文章和约31万字的新闻,肆无忌惮地攻击中国。人民社会党、国大党右派潘特、德赛等甚至组织反华游行,支持“西藏独立”^{[12]80}。1959年5月,周恩来总理会见11个国家的访华代表团和驻华使节时发表的谈话,对印度在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发动的武装叛乱中扮演的角色进行了全面深刻地总结“尼赫鲁和印度上层人士很怕西藏改革,反对改革,甚至说改革不可能。这是很奇怪的现象,西藏是中国的领土,他们却反对西藏的改革,这就发生了他们干涉我国内政和违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问题。他们希望西藏长期保持落后状态,成为中印间的‘缓冲国’。这是他们

的主导思想,也是中印间的争论中心。”^{[13]269}同时,他还指出“印度一部分上层人士希望西藏落后制度不变,保持使西藏成为‘缓冲国’的想法,在西藏反动集团中起了很大作用。西藏反动分子纷纷到噶伦堡去,他们同蒋介石、美国、英国的特务来往活动,没有印度的许可是搞不成的。所以我们说,多少年来噶伦堡就成为西藏叛乱分子在外国活动的中心。西藏上层统治阶级要维持剥削,反对改革,这是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发动的武装叛乱的主要原因,但没有外来的鼓励、煽动,也不可能发动这样的叛乱。这些叛乱分子在印度听到和当年从英国听到的相类似的话,因此,他们就把希望寄托于印度。”^{[13]272-273}从冷战的角度出发,“他们想用冷战和政治压力搞一个印度、中国、西藏的三角会议,来干涉中国的内政。他们现在已从各方面透露这种消息并且开始进行试探,这是英帝国主义者在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四年搞西姆拉会议的翻版。”^{[13]275}同时,中国中央政府鲜明地指出了印度政府采取上述行动的严重后果:“印度政府的负责人公开怀疑中国正式公布的文件,指责中国政府,以及隆重欢迎达赖喇嘛等言行,不管主观意图是什么,客观上都无疑地起了鼓励西藏叛乱分子的作用。”^{[14]640}1960年初,在印度的支持下,十四世达赖在穆索里组成了流亡噶厦及其下属机构。不久,十四世达赖将流亡大本营迁到印度西北部喜马偕尔邦康拉县达兰萨拉^[15]。

上述继承英国在西藏的殖民遗产的行动除了印度自身认知和立场外,与冷战时期美、苏对作为中间地带国家印度的争夺亦有很大关系。1959年西藏武装叛乱前,虽然尼赫鲁政府奉行不结盟政策,在朝鲜战争、台湾地位、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等一系列问题上坚持作为中间地带国家的立场和主张,但美国为了遏制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和中国,1956年开始调整其南亚政策,通过加大对印经济援助的方式期望在亚洲树立一个能与共产主义抗衡的“民主橱窗”。1956年12月尼赫鲁访美前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先后推出第5617和

5701号文件^①,不断强化其南亚政策,培植一个强大的印度来限制苏联和中国在南亚和东南亚的影响^[16]。据统计,“从1956年到1959年即尼赫鲁对外政策右转时期,美国援助为19.36亿美元,平均每年为6.45亿美元。而在1959年下半年到1962年7月,尼赫鲁公开反华后,美援急剧增加,高达38.72亿美元,年平均为12.9亿美元。”^{[12]100}但也应当看到,50年代上半期,苏联对印度的政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布尔加宁的一句话非常具有代表性,他说:“我们并不想让尼赫鲁成为一个共产党人,我们希望尼赫鲁就是尼赫鲁”。尼赫鲁1955年6月访问苏联,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欢迎。苏联称赞印度是“大国”“维护和平的重要力量”等。当时印度驻苏大使K. P. S. 梅农说,俄国人在赞扬印度的一切东西^[17]。可以说,中印之间围绕“西藏问题”展开的斗争,为美、苏相互遏制甚至遏制中国提供了机会,一定程度上使印度成为冷战的获益者。从美国角度来看,对印度的援助则是出于应对“共产主义威胁”的目的;从苏联角度出发,对印度的援助则是防止其与西方阵营结盟,总而言之,双方都是抱着冷战思维。对于中国而言,1959年的全面武装叛乱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印边界冲突“导致中共领导人对印度外交和尼赫鲁的认识发生根本变化。”在“革命外交”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将印度归为中间地带国家中“由好变坏”的一类。

四、苏联:中苏关系开始恶化的一个征兆

在1959年西藏反动上层发动的全面武装叛乱和之后的中印边境冲突中,苏联一定程度上采取了支持印度的立场,这主要是由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中苏关系逐步恶化导致的,是中苏关系恶化的一个征兆。

1949年10月,中苏建交,苏联成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国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加强和发展了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在这样的背景下,中苏关系快速发展。1954年

9月,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和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举行了会谈,……这次会谈成为中苏蜜月期的开始^[18]。但50年代后期,中苏两党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以及在今后的对外斗争的路线方针上,开始出现一些分歧。1958年随着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不断强化,对中国的干涉愈加强烈。毛泽东后来说,中苏闹翻实际上是在1958年,他们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1959年,中苏分歧进一步发展,双方矛盾开始暴露出来。围绕西藏反动上层发动全面武装叛乱,苏联官方没有发表公开声明,报刊也没有发表评论,但是苏联报刊既报道了我国的新闻公报,也报道印度官方及报界的评论和英美等西方国家的反应,而且在报道数量上,后者大大超过了前者,充满了大量污蔑和攻击中国的言论,貌似客观公正,实际上偏袒西藏叛乱集团及其幕后支持者印度当局^{[19]192}。1959年8月,由于印度军队侵入中国西藏的朗久而发生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印边境的第一次武装冲突。作为赫鲁晓夫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见面的“贡礼”,苏联塔斯社(1959年)9月9日发表关于中印边境冲突的声明。塔斯社的声明完全避开印度挑起这次中印边境冲突的事实,声明对中印边境发生的事件表示“遗憾”,说中印边境的冲突是“那些企图阻碍国际紧张局势缓和的人搞的”。而且声明还进一步说这件事情“使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同志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互相访问前夕的局势复杂起来”。这些话显然是表示赫鲁晓夫对在他访美之前发生这一事件非常不满,责怪中国,偏袒印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公开无理指责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偏袒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这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事情^{[19]208}。10月初,赫鲁晓夫与毛泽东、刘少奇、

^① 艾森豪威尔在批准第5701号文件时强调“美国对外援助的基本目标是向非共产党的政府提供援助,以避免它们陷入苏联的统治之中。假如我们不援助印度这样的国家,苏维埃俄国肯定会那样做。”转引自戴超武主编《亚洲冷战史研究》,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版,第242页。

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的见面会谈中,还用了很多的口舌说中印边界问题。他认为尼赫鲁是中立的,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说中国应该和他搞好团结,不能和他打仗^[20]。进入 1960 年,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根据代表团的报告(1960 年 2 月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赫鲁晓夫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完全偏袒印度,指责中国。他指责中国违背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赫鲁晓夫说,中印边界冲突和放走达赖喇嘛,给印度共产党造成困难,使得印度共产党在喀拉拉邦竞选失败,又使尼赫鲁更加右倾,使得南亚和东南亚各国对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不信任。他还明白宣布,他不相信印度是侵略者。但是他又表示,他不愿意研究这个问题的细节。他蛮不讲理地说,反正中国跟印度发生冲突就是中国不对。9 月 9 日塔斯社声明是“帮助”中国的^{[18][251]}。

放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中苏关系大变化的背景下评判苏联在中央政府平息西藏反动上层发动的全面武装叛乱、中印边境冲突问题上的态度变化,可以看出,“从 1959 年底到 1962 年中印边界冲突爆发之前,中印边界问题成为中苏之间激烈争论的一个关键问题,其中既包含国家利益的冲突,同时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中苏两党在涉及意识形态的重大问题上的根本分歧。”^[21]上述有关西藏事件的发生是中苏关系由热转冷、由好变坏的表现之一,成为中苏关系恶化的一个征兆。但同时也应当看到,苏联在西藏反动上层发动的全面武装叛乱、中印边境问题上的立场变化,与赫鲁晓夫上台后对美国、第三世界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调整有关。赫鲁晓夫上台后,随着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和平竞赛”的口号被提出,苏联与美国的关系有所缓和。1958 年 12 月 1 日,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会见了美国参议员汉费莱。1959 年 1 月苏联领导人米高扬访问美国。1959 年 9 月,赫鲁晓夫在出访中国之前,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举行了 3 天的戴维营会谈,并发表了会谈公报。在与中间地带国家的关系上,赫鲁晓夫上台后,认为斯大林忽略了中间地带国家,逐步调整

了对包括印度在内的中间地带国家的政策。在对外实践上,1953 年 7 月苏联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的发言就是这种改变政策和发动经济攻势的讯号,不久苏联同印度签订了贸易协定。

1955 年赫鲁晓夫出访印度、缅甸和阿富汗期间表示,苏联愿意在经济和军事方面,与第三世界非社会主义国家就其“国家发展”进行合作^[22]。苏共二十大上,一个所谓“和平地带”的提法代替了两个阵营的理论,这个苏联术语的含义是指苏联和不结盟的不发达国家在和平、开发、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以及裁军等问题上的共同立场^[23]。体现在对外关系上,苏共二十大之后,印度的外交政策在苏联越来越受重视,其不结盟政策由于被世界超级大国之一所接受,而在国际上受到了尊重。1957 年 6 月 1 日,布尔加宁^①告诉印度驻莫斯科大使梅农,苏联是印度真正的朋友并且将永远与印度站在一起^[24]。从贸易角度来看,作为苏联的受援国,印度 1956、1957 年和苏联之间的贸易以特别高的速度扩大。“1955 年,两国的贸易共计只有 1170 万美元,但是在 1957 年已经增长到 12660 万美元。”^[25] 50 年代末,苏联给予印度的经济信贷和赠款在南亚八国^②中位居第一,并且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其他国家。1955—1959 年,这个数量为 6.86 亿美元。所以 1959 年当事关西藏的一系列事件发生后,苏联采取了站在印度一边的立场。也有观点认为,中印之间围绕西藏反动上层发动的全面武装叛乱事件、边境冲突的争端是中苏争端所起作用的结果,莫亨·拉姆认为,“在中苏关系得到缓解以前,想使印中关系正常化是徒劳无益的。”^[26]戴超武也认为:“赫鲁晓

① 全名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布尔加宁,1895 年 5 月 30 日生于下诺夫哥罗德,1975 年 2 月 24 日在莫斯科逝世,苏联国务和党务活动家、军事家,社会主义劳动英雄(1955),上将军衔(1947—1958 年军衔是苏联元帅),曾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等职务。1957 年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② 南亚八国分别是阿富汗、缅甸、柬埔寨、锡兰(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尼泊尔、巴基斯坦。

夫时期苏联和印度关系的发展,直接影响到苏联对中印边界问题的反应,也直接影响到中共中央对苏联整个外交政策的认识和判断。”^①因为随着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苏联“中立”的天平逐渐向印度倾斜,而这又进一步加剧了中苏关系的恶化。

五、结语

回顾历史,关照现实,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历史是现实的根源。虽然伴随着苏联的解体,冷战时代早已宣告结束,但冷战思维、意识形态偏见仍未消亡,并且有不断加剧之势。在所谓的“西藏问题”上,近年来美国采取遏制战略新方式,如2002年通过“西藏政策法案”、2018年生效“2018年对等进入西藏法案”、2020年通过“西藏政策法案”,以及《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中也提及西藏,以期实现全面打压中国的目的。印度一方面在十四世达赖问题上坚持其一贯策略,一方面则继续采取“前进政策”,在中印边境不断挑起摩擦乃至制造冲突,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反观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直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未侵犯别国领土、干涉别国内政。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目标,是对传统地缘政治观念、冷战思维的有力应对或回击。

[参考文献]

- [1] 史蒂文·胡克约翰·斯帕尼尔. 二战后的美国对外政策 [M]. 白云,李巧英,贾启辰,译. 北京:金城出版社,2015.
- [2] 汪晖. 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外二篇) [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62-64.
- [3] 约翰·肯尼思·克瑙斯. 冷战孤儿——美国和西藏为争取生存的抗争(内部资料) [M]. 傅小强,胡仕胜,等,译. [出版地不详][出版日期不详]: 363.
- [4] 周爱明,袁莎. 金钥匙·十七条协议 [M]. 福州:鹭江出版社,2004.
- [5]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 遏制战略: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 [M]. 时殷弘,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 [6] 郭永虎.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中国西藏的情报评估与侦察 [J]. 军事历史研究,2016(3).
- [7] 戴超武,梁志. 美国对华情报档案解密(第八卷) [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 108.
- [8] 郭永虎. 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中的“西藏问题” [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 32,34,36.
- [9] 唐家璇. 世界外交辞典 [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403.
- [10] 谭·戈伦夫. 现代西藏的诞生 [M]. 伍昆明,王宝玉,译.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
- [11] 裴坚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 [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 [12] 杨公素. 中国西藏地方的涉外问题 [M].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资料征审委员会,1985.
-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周恩来外交文选 [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5.
-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外交文选 [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640.
- [15] 张植荣,魏云鹏. 阴谋与阳谋——实录近代美国对藏政策 [M].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 119-120.
- [16] 王陆野. 尼赫鲁执政时期中印关系中的美国因素 [J]. 理论观察,2018(2).
- [17] 戴超武. 亚洲冷战史研究 [M].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6: 254.
- [18] 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档案》栏目. 中苏外交档案解密 [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 104-105.
- [19] 吴冷西. 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册)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 [20] 董保存. 钓鱼台往事追踪报告之一 [J]. 世界军事,2017(8).
- [21] 戴超武. 中印边界冲突与苏联的反应和政策 [J] // 沈志华,李滨. 脆弱的联盟:冷战与中苏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354.
- [22] 文安立. 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

^① 参见戴超武《中印边界冲突与苏联的反应和政策》,收录于《脆弱的联盟:冷战与中苏关系》(沈志华、李滨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50页。

- 的形成 [M]. 牛可, 等, 译.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4: 65.
- [23] 罗伯特·沃尔特斯. 美苏援助对比分析 [M]. 陈源, 范坝,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4: 31.
- [24] 克里希南·斯里尼瓦桑. 外交渠道 [M]. 张林, 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20: 84, 86.
- [25] 詹姆斯·理查德·卡特. 苏联对外援助净成本 [M]. 陈绎,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3: 68.
- [26] 卡·古普塔. 中印边界秘史 [M]. 王宏伟, 王至亭, 译.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0: 8.

The Full – scale Armed Rebellion Launched by the Reactionary Upper Class in Xizang in 1959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ld War: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Roles and Ac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dia and the Soviet Union

Yang Yabo

(*Institute of South Asia Studies, Tibet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Lhasa, Tibet 850000, China*)

Keywords: Tibet; Full – scale Armed Rebellion; Containment Policy; Political Heritage; Intermediate zone

Abstract: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Truman Doctrin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came more and more complicated, the whole world entered the stage of Cold War. In the year of 1949, New China adopted the ‘Leaning to one side’ diplomatic policy, firmly stranded on the side of socialist camp headed by the Soviet Union.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is situation, the government of United States took a series of actions revolved around the full – scale armed rebellion launched by the reactionary upper class in Xizang in 1959, which constituted a part of its policy of containment against China. Mean while, India gained its independence and fully inherited the colonial heritage left by the British Empire. Therefore, it speeded up its process of invading China and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helping 14th Dalai Lama group fled to India after their failure armed rebellion. The 20th Congress of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is the breakdown mark of Sino – Soviet relations after a ‘honeymoon period’. The Soviet Union’s pro – India stance in the armed rebellion launched by the reactionary upper class in Xizang and Sino – India border clash became symptom of the deterioration of Sino – Soviet relations. During this period, United States and Soviet Union competed with each other for representing the ‘intermediate zone’ India. Through the armed rebellion launched by the reactionary upper class in Xizang and Sino – India border clash in 1959, it could be told that the theory of two camps and the bipolar system cannot properly explain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hile Mao Zedong’s ‘the middle zone’ theory was more in line with the international reality at that time.

[责任编辑: 王 雷]

[责任校对: 胡 朗]